

中智建交50周年纪念专题

半个世纪的持续友好与优势互补： 智中关系的历史发展与新机遇

[智利] 贺乔治

内容提要：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洲国家。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友好稳定发展，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日益深化。智中两国经济互补性强，自贸协定签订以来，两国贸易呈现出跨越式增长。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面对当前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沙文主义大潮，智利和中国始终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并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智利将亚太地区定位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领域，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以及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召开，更是开启了智中关系借力国际多边平台发展的新时代。本文旨在对智中关系进行梳理，着重关注2014—2018年间即巴切莱特总统第二届任期的一些重要事件，考察两国关系“贸易多、投资少”悖论，并对相关时期的外交政策和重要倡议进行研究。

关键词：智中关系 贸易 投资 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 亚投行 中拉论坛

作者简介：[智利]贺乔治（Jorge Heine），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专业教授，曾于2014—2017年间担任智利驻华大使。

中图分类号：D822.37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0）05-0013-13

2015年5月24—26日，时任智利总统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宴请到访智利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此次访问是李克强总理南美之行的一部分（此外，李克强总理还访问了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旨在促进中国与南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在与智利签署的众多协议中，智中两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是突出亮点。通过此合作，两国可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不必再承担将智利比索兑换成美元、再由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的费用。

继2014年巴切莱特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两次会晤之后（一次于2014年7月在福塔莱萨金砖国家峰会举行之际；另一次于2014年11月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李克强总理访问智利的议程涉及多个主题，其中大多数是在双边关系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经济主题。两国共签署了18项协议。作为巩固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双方举行了首次经济合作与协调战略对话，对话由智利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以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主持。双方签署了自贸协定升级谅解备忘录，以推进两国2006年以来业已生效的自贸协定，将电子商务、公共部门采购和金融服务等纳入其中（2017年11月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双方签署了2.0版本的自贸协定）。智利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并宣布由当时正在建设智利分行的中国第二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此举与将圣地亚哥变为南美金融中心的长期愿望（尽管距离实现还很遥远）非常吻合。双方还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此外，负责基础设施、运输和能源领域的各工作组也举行了会谈。^①

这些议程表明智中双边关系日趋成熟。本文旨在对此关系进行梳理，着重关注2014—2018年间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该阶段为巴切莱特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同时与习近平主席第一届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重叠。在这一时期智中双边领域发生了多个重大事件，包括4次最高级别的正式访问，这是前所未有的。本文第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智中关系；第二部分考察了智中关系中的“贸易多、投资少”悖论；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研究了相关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倡议；最后得出一些结论。

^① Heraldo Muñoz, “Un Hito de China en Chile”, en *La Tercera*, 30 de mayo de 2015.

一 智中关系发展历史

智中关系基石的奠定源于1970年12月，当时正值冷战，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智利是南美洲第一个，也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个（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智中建交比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早14个月，比美国卡特政府1979年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早近十年。在像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这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圣地亚哥期间几次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2年在智利获得了其在拉美地区的首次非正式承认：在时任参议员萨尔瓦多·阿连德和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等几位杰出人物的倡议下，成立了“智利—中国文化协会”。^①文化在促进两国关系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聂鲁达在当今中国依然广受欢迎，出版商不断推出其作品的中文新译本，发行量相当可观。智利和中国都认为自己是“诗人之国”。

1990年以来，中国历届国家主席、多任总理与智利历任总统都进行了互访（见表1），确保了两国交流的连续性，促进了双方各项协议的签署，并将双边关系提高到了目前的水平。

在建交之后的几十年中，智中关系蓬勃发展，智利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了其对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支持。1999年，智利是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拉美国家。2004年，智利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拉美国家。2005年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首次与单一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在此之前，中国于2003年与东盟签署了一份协定）。^②

^① 智中关系的历史，参见 Yun Tso Lee y Wu Hongying (eds.), *Chile y China: Cuarenta Años de Política Exterior*, Santiago: RIL, 2011; 江时学着重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伊瓦涅斯（Carlos Ibáñez del Campo）政府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进行的努力，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国贸易办事处在智利的开设，参见 Jiang Shixue, “Relaciones Bilaterales Chileno - Chinas en el Umbral del Nuevo Siglo”,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34, No. 133, 2001, pp. 22 - 36.

^② Juan Carlos Gachúz, “Chi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0, No. 1, pp. 133 - 154.

表1 1990—2020年期间智中高层互访情况

1990年5月	杨尚昆主席访问智利
1992年11月	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总统访华
1995年11月	爱德华多·弗雷总统访华
1996年11月	李鹏总理访问智利
2001年4月	江泽民主席访问智利
2001年10月	里卡多·拉戈斯总统访华
2004年11月	胡锦涛主席访问智利
2008年4月	米歇尔·巴切莱特总统访华
2010年11月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总统访华
2012年6月	温家宝总理访问智利
2014年11月	米歇尔·巴切莱特总统访华
2015年5月	李克强总理访问智利
2016年11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智利
2017年5月	米歇尔·巴切莱特总统访华
2019年4月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总统访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官方资料整理。

智中自贸协定的谈判仅持续了8个月就陷入僵局。原因是智利谈判代表、时任智利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总司司长（后任农业部长）卡洛斯·福彻（Carlos Furche）与中国谈判代表、时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后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就是否将葡萄酒纳入自贸协定的意见存在分歧。福彻坚持将葡萄酒纳入自贸协定。面对他的坚持，易小准副部长使用了多个技术论证，最后说：“对于智利来说，将葡萄酒纳入该协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中国人太多了，会喝完所有的智利葡萄酒，什么也不给你们留下。”短暂的停留后，福彻回答：“别担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智利愿意做出牺牲，我们会购买阿根廷葡萄酒。”智利葡萄酒最终被纳入协定，而且确实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销量不足以耗尽所有智利葡萄酒）。^①2016年，中国取代美国 and 英国等传统市场，成为智利葡萄酒的最大消费市场。同年，仅法国销往中国的葡萄酒多于智利。如今，相比华盛顿或纽约，在北京或上海餐馆找到智利葡

^① 2014年9月，笔者与卡洛斯·福彻在北京的访谈内容。

葡萄酒要容易得多。^①

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该自贸协定对双边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2006年（自贸协定生效之年）到2007年间，智利对华出口从52.55亿美元增加到105.05亿美元，翻了一番。^②

自1990年智利向民主制度过渡以来，所有智利总统都访问过中国，其中几位曾多次访华。多位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也访问了智利。习近平主席曾三度访问智利（2001年以浙江省委书记身份、2011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2016年以国家主席身份进行国事访问）。如果2019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没有取消，习主席本会在峰会举办之际第四次访问智利，这些均象征着与日趋紧密的商业关系并驾齐驱的双边政治联系日益牢固。

二 “贸易多、投资少”的悖论

2006—2007年间双边贸易取得的最初飞跃并没有就此停止。^③两国贸易总额在2005—2018年间增长了4倍，从2005年的80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10亿美元。同期智利对中国的出口额也增长了4倍，从2005年的4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50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智利的主要贸易伙伴。2018年，智利对中国的出口额是对美国出口额的2.5倍。

智利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铜，这并不奇怪。智利拥有全球已探明铜矿储量的29%，是最大的铜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铜进口国和消费国，年消费量占全球比重接近4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智利出口的单一化。智利水果行业的表现尤为突出，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呈指数增长。2016年智利超过泰国和越南等中国邻国，成为中国第一大水果进口国，贸易额接近12亿美元。按价值计算，2016年中国进口的水果中有1/4来自智利。

^① 笔者在华任职期间最喜悦的时刻之一是，2017年5月在智利驻华大使馆举行的盛大仪式上授予世贸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奥希金斯勋章，该勋章是对其在促进双边关系发展以及在世贸组织中所做工作的认可，同样是对自由贸易重要性的认可。

^② 有关智中贸易的数据，参见智利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总司网站（<http://www.direcon.cl>）。关于智利与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头十年的评估，参见DIRECON，“Análisis de las Relaciones Comerciales entre Chile y China en el Marco del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Santiago：DIRECON，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Chile，2014。

^③ 以下段落内容参见Jorge Heine，“The Chile-China Paradox：Burgeoning Trade，Little Investment”，in *Asian Perspective*，Vol. 40，2016，pp. 653-673。

有理由认为这种趋势在将来会持续下去。中国拥有全球19%的人口，却仅拥有地球淡水储备的7%。这意味着中国的庞大人口对食品进口的需求将持续存在。考虑到中国人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其对新鲜水果的需求将持续增长。智利已成功在中国树立了优质水果生产地的声誉，并一直在扩大其供应范围，从苹果、李子、葡萄和猕猴桃到蓝莓、樱桃和油桃等价值更高的食品，近期还增加了柑橘。智利作为新鲜水果出口国（智利是南半球最大的水果出口国）的成功秘诀不仅在于其生产地中海气候区高品质水果的能力，还在于其掌握的收割、包装和冷藏运输技术，使水果可以进入中国那样距离遥远的市场，更在于其凭借“智利品牌”的良好声誉，不断扩大产品供应和种类的能力。^①

无论是从智利对华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还是从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来看，智利都是与中国贸易最多的拉美国家。2018年，智利32%的出口流向了美国。我们不知道2020年影响世界的疫情将如何影响未来总体贸易，尤其是如何影响智利的贸易，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表明，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2020年实现增长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因此，过去20年来我们看到的趋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②

然而，智利与中国双边关系的悖论之一就是这些巨大的贸易流量（我们要看到，智利是一个仅拥有1800万居民、在地球上与中国相距最遥远的国家，其与中国的贸易量大于巴基斯坦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中国邻国）没有与投资流量齐头并进。

尤其令人感到好奇的是，鉴于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主要流向采掘业和自然资源领域，且智利拥有出口性农矿业经济，这本应对中国公司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此外，智利在整个拉丁美洲乃至世界都对外国直接投资极具吸引力，在某些年份中，智利成为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十大国家之一，可大致说明智利为外资提供的恰当条件和良好营商环境。

智利没有大量的石油或天然气储量，但它是一个杰出的矿业国家，因此可以期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资。但是，期望却没有变为现实。鉴于中国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这一点是违反一般认知的。事实上，智利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矿业国家，其采矿业高度发达，吸引了一些大型矿业公司的关

^① Dirección de Relaciones Económicas Internacionales, “China como Comprador Mundial de Productos Agrícolas, Pesqueros y Alimenticios”,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Chile, 2014.

^②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World Economic Update, June 2020: A Crisis Like no Other, an Uncertain Recovery”, Washington D. C., junio de 2020.

注，例如盎格鲁美洲公司、力拓集团、必和必拓公司。这意味着为寻找矿产资源，其大部分土地已被勘探。另一方面，秘鲁拥有的矿藏与智利不相上下（有人说过，“安第斯山脉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矿”），但秘鲁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各种武装暴动和政治动荡的困扰，吓退了很多投资者。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因拥有广阔的矿藏，秘鲁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

智利不仅采矿业竞争非常激烈，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在拉美许多国家，合作项目（例如，铁路或水坝）是通过政府间合作协议进行的。但是在智利，一切都必须招标。这涉及一个相对复杂的法律程序，很多中国公司对此并不熟悉，因而遭遇了一些挑战。智利一部分投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以公私合营（PPP）的方式进行的。智利一直是此类实践的先驱，在 1997—2007 年间吸引了大约 80 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其中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来自西班牙、墨西哥和意大利）。智利因此拥有了被认为是拉美地区最好的高速公路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但是，在智利（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公司在这些招标中表现不佳，包括在程序、商业模式和风险承担方面。智利道路、桥梁或隧道等基础设施投资招标项目不在于签订合同盈利，而是通过建好后长期收取通行费来获得投资回报。这意味着与大多数中国公司的习惯做法截然不同的时间期限和营业领域。实际上，中国关于基础设施项目中公私合营的法律在 2015 年才生效，比智利晚了 20 年，这一概念在中国公司中并不广为人知。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8 年，中国公司天齐锂业以 4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球最大锂生产商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QM）1/4 的股权，这是圣地亚哥证券交易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智利国税局因此征收了由商业交易产生的最高税费，金额高达 10 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在智利投资的一大转折^①。在此新阶段，智中双边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使经贸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以卓有成效的经济联系推动智利进一步参与世界贸易的核心价值链。铜矿产业仅仅让我们窥见了一些光亮，我们的期望是被描述为“21 世纪的白金”的锂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

^① “Tianqi Sella su Ingreso en la Propiedad de SQM en la Mayor Operación en la Historia de la Bolsa de Santiago”, en *La Tercera*, 3 de diciembre de 2018.

三 全球化中的智利和中国

智利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止于双边。尽管距离遥远，体量、历史和文化有所差异，但智利和中国存在许多共同点。两者都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真实例子。

共同点之一是对自由贸易的承诺。智利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体现出先锋作用，与65个国家签署了29个协定，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是智利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有意识制定的一项战略，旨在推动包括多边、双边和区域在内的各方面贸易自由化，其中双边和多边协定起关键作用。对于一个基于出口发展模式的小经济体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智利出口在1990—2007年期间从90亿美元增至810亿美元（增长8倍）的原因。

与这一战略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战略，即“将全球化定义为亚洲化”。这意味着将亚太地区确定为智利外交政策的优先领域，由此智利于1994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智利是这样做的第二个拉美国家），并成为第一个与亚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2003年与韩国签署自贸协定）。2005年智利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6年又与印度签署局部自由贸易协定。根据2020年某些指标，智利为拉美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其近年来取得的高水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取得的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特别是自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向国际贸易和投资打开了大门，这一开放政策成为“中国奇迹”的推动引擎，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使7.5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制造国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利和中国经济的开放都是两国发展的关键。在与智利签署自贸协定之后，中国相继与澳大利亚（中澳自贸协定于2015年生效）、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等其他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同时，智利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不完全开放其资本账户以防止金融市场的猛烈波动，中国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从而避免了包括2008—2009年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化时代最具危害性的影响。

在强大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沙文主义潮流盛行的时代，美国和欧洲

不同民粹主义运动放弃自由贸易，呼吁在世界范围内阻碍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但智利和中国关于自由贸易益处的立场仍然是积极的。多边主义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正经历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遭到了不同西方大国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强烈谴责。他们将对国际组织的批评当作获得国内政治资本的工具。

智利长期致力于多边主义。它的外交政策（1973—1990年军事独裁时期除外）传统上是尊重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组织为基础的，智利还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①。智利在过去的25年中曾三度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智利人胡安·索马维亚（Juan Somavía）担任过联合国系统中历史最悠久的机构之一即国际劳工组织的三届领导人；米歇尔·巴切莱特自2018年起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些都绝非偶然。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预算第二大出资国。2020年，联合国系统15个机构中的4个由中国人领导，分别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自2015年以来由柳芳担任秘书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自2019年起由屈冬玉担任总干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自2013年起由李勇担任总干事；国际电信联盟，自2015年以来由赵厚麟担任秘书长。中国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遭受猛烈攻击的时候，中国对它们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因此，毫无疑问，在一个要求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合作的世界中，智利和中国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合作。

四 2014—2017年智中多边合作

在此框架下，本文将提到智利与中国三个方面的合作，这三方面是笔者在北京任职期间亲眼见证的，其中两个是全球性的，一个是地区性的。实际

^① Jorge Heine,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Latin America and Multilateralism after 9.11”, in Edward Newman and John Ti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Under Challenge? Power,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tructural Change*,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81–503.

上，自2013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这是不同于邓小平提出的谨慎行事、保持低调的外交建议（“韬光养晦”）的阶段。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提出了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多项倡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习近平在其任期的第一个五年中出访达50次左右。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许是当今最雄心勃勃的发展倡议），并成立了两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一家在北京，另一家在上海。

（一）“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一条新的“丝绸之路”重塑欧亚大陆，并在东亚和欧洲之间建立广泛的陆地和海洋联系网络。该倡议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比2014年7月笔者抵达北京早几个月。笔者必须承认，这个项目是如此雄心勃勃，以至于一开始引发了本人一定程度的怀疑。如此庞大的项目资源将从何而来？即使有资源，由哪个机构来负责这一倡议的实施？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后，这些都已成为现实，数百个项目将亚洲和欧洲连接起来，投资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它还扩大了范围，成为面向南方国家的发展倡议，不仅包括亚洲和欧洲国家，还包括非洲和美洲国家。中国的规划是，对中国有效的方法，即联结中国广袤土地的基础设施和连通性，也可以对相应领域发展严重不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起作用。^②

2017年5月，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共有3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巴切莱特总统在其发言中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对美洲特别是智利的重要性。事实上，2016年1月，智利政府建议中国在智利和中国之间建设海底光缆，从而在亚洲和南美之间建立第一个直接的互联网连接，这是数字时代的基础。该计划在两国谅解备忘录中已正式确定。^③2018年11月，智利外交部长安普埃罗（Roberto Ampuero）在北京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使智利成为签署此类文件的19个美洲国家之一。2017年巴切莱特总统是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

^① Kerry Brown, *China's World: What Does China Want?*, Londres: I. B. Tauris, 2017. 这本书提供了有关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全景视角。

^② Daniel Drache, A. T. Kingsmith, and Duan Qi, *One Road, Many Dreams: China's Bold Plan to Remake the Global Economy*, Londres: Bloomsbury China, 2019; Min Ye, *The Belt Road and Beyond: State Mobilization in China 1998-2018*, Nueva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③ Jorge Heine, “La Conexión Digital China-Chile”, en *La Tercera*, 27 de septiembre de 2016.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两个拉美国家元首之一。2019年4月，智利的另一位总统皮涅拉是拉美地区唯一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家元首。

对于智利这样相距遥远又严重依赖世界贸易的国家而言，连通性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21世纪转变为中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倡议，这对智利非常重要。南美洲两洋走廊的建设就是为智利提供的诸多机会之一。但是，疫情对“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在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①

（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成立，该银行有57个创始成员国，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在与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共同参加的各种午餐会中，本人观察到了这样一个机构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所蕴含的深意。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金立群的杰出领导，亚投行就不可能成立。考虑到亚投行创立过程中遭遇的不同领域的反对，及为其创建所需付出的诸多努力，这种观点并不令人惊讶。这位转型成为银行家的英语语言文学专家曾将拜伦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他说的英语无可挑剔，是一个非常老练而优雅的人。有时确实需要像人文银行家这样特别的人来承担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亚投行冲破了所有悲观预测，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经济体纳为其创始成员国，现在拥有超过80个正式成员，如果考虑意向成员国，则成员数超过100个。^②

笔者的最初目标是使智利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是不久之后，又意识到这是不可行的。智利高达60%的出口都流向亚洲，而亚投行则考虑向非域内成员的、与亚洲相关的项目提供贷款。智利成为一个亚洲开发性银行成员的提议，对于像智利财政部这样传统的机构而言，不能算是合理的。^③

幸运的是，巴切莱特总统确实非常了解与整个亚洲特别是与中国关系的

^① Fermín Koop, “Coronavirus Reshapes Belt and Road in Latin America”, en *Diálogo Chino*, 30 de julio de 2020.

^② 有关亚投行创建的有趣描述，请参考亚投行法律顾问的文章。Natalie Lichtenstein, “AIIB at Three: A Compa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Global Policy*, August 30, 2019.

^③ 在撰写本文时，已有8个南美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包括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但只有两个国家拥有正式成员资格，即厄瓜多尔和乌拉圭。参见 Alvaro I. Méndez and Mariano Turz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The AIIB Dimension*,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20.

重要性，在习近平主席于2016年11月对智利进行的国事访问中，她表达了智利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愿望。因此，她于2017年5月访问亚投行北京总部，成为访问其总部的首位国家元首，智利则作为意向成员加入亚投行。正式加入亚投行对于智利来说仍有许多困难，但至少已经垒起了第一块基石。

（三）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

在笔者任职北京期间，中国不仅在双边层面，而且在区域层面表现出与拉美国家交往的兴趣。鉴于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规模差异，这是可以理解的。除规模差异之外，还存在区域性（例如基础设施项目或环境类项目）和全球性（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值得中国与该地区国家政府集体商讨。

在这方面，中国的一项主动行动是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7月访问巴西时宣布定期举行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论坛计划每三年举行一次外交部长级会议。首届会议已于2015年1月在北京举行，笔者作为智利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大型活动中，有4位国家元首、30位外交部长和40个代表团参加。这是中国“主场外交”的一次展示。中国的热情好客在美食、住宿和各种演出中得到体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会面与具体的合作承诺齐头并进。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宣布成立一系列旨在促进拉美国家发展的合作基金，其中包括几千万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2018年1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延续了首届会议的承诺，会议议程之一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拉丁美洲的立场。然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存在制度性弱点，如没有常设秘书处和自己的预算，仅依赖轮值主席国外交部指定的管理部门的有限资源，这限制了其工作及中拉论坛的有效性。

2020年担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的墨西哥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并于2020年2月与29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议。2020年7月23日，墨西哥与中国共同组织了中拉外交部长视频会议，13个国家参与对话，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机。作为会议成果，中国承诺向拉方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抗疫医疗设备和药品储备。

五 结论

国际秩序正在过渡之中，过去70年国际秩序的基础支柱正在受到质疑。

这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智利和中国在半个世纪内建立的紧密联系则以其连续性和稳定性著称。尽管两国在这 50 年来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但两国政府仍将双边关系的维护和发展置于其他考虑之上。这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一个又一个建设性的决定中、在不断实现的对未来的期许中，智中双方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牢固的外交关系。

毋庸置疑，中国这样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文明古国和太空大国，与智利这样位于世界尽头的中等拉美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正如本文所见，对于智利这个基于出口发展模式的经济体来说，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合作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尽管智利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与中国的关系为今天智利发展成为拉美最发达的国家（根据一些指标判断）做出了诸多贡献。

历史上，智利是拉丁美洲最早兴起的国家，已在许多方面脱颖而出。就像加利福尼亚州之于美国一样，传统观念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首先在智利发生，然后才在拉美地区其他地方发生，使其成为拉丁美洲的“先锋”。这未必完全正确，但世界上许多观察家都这样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扩大其在美洲的存在之际，与智利的联系和对话使中国在该地区拥有了可靠和可预测的合作伙伴。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是关键，这要归功于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以及频繁的高层互访。

毫无疑问，当前影响国际秩序的紧张局势不仅会考验中国和智利之间的关系，还将考验中国与整个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但是，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向我们表明，就像过去的许多其他挑战一样，新的挑战也将被克服，智利和中国这两个“诗人之国”间的关系将得以继续繁荣发展。

（翻译 周宸伊；责任编辑 王 帅）